

# 清代蒙古文《大藏经》翻译、刊行及其流传的历史考察

胡日查

(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摘要]** 元代以来蒙古族高僧对梵、藏文佛经的不断蒙译、16-18世纪蒙古地区形成的寺院教育网络和清朝极力扶植藏传佛教以及对各民族推行“同文治之”的文化政策等对清代藏文《甘珠尔》《丹珠尔》完整地翻译成蒙古文并木刻刊行提供了政治文化条件。康熙、乾隆为首的清朝统治者不仅提倡以蒙古文翻译、刊刻《甘珠尔》《丹珠尔》的佛教文化工程,还直接参与了它的定价以及颁行环节。而内蒙古东部蒙旗之所以更多地迎请或直到20世纪上半期还能够大量收藏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其很重要的原因是与一世内齐托音呼图克图及其众弟子在东部蒙古各部用蒙古语传播藏传佛教教义教规或以蒙古语诵经的历史传统有直接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清代藏文《大藏经》完整地翻译成蒙古文并木刻刊行,不仅促进了蒙、藏、汉、满等多民族之间佛教文化的深度交流,而且对藏传佛教的本土化、中国化发展历史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 清代; 蒙古文《大藏经》; 翻译; 刊行; 流传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22) 04-0147-09

**DOI:**10.15970/j.cnki.1005-8575.2022.04.009

蒙古文《大藏经》是蒙古族传统物质文化遗产之大宗,也是保存至今的蒙古族各种文献中篇幅最长的一部,在蒙古族文化史上影响巨大,举足轻重。蒙古文《大藏经》是藏文《大藏经》的翻译本,由《甘珠尔》《丹珠尔》组成,系西藏佛教的最大宗经典。藏文《甘珠尔》《丹珠尔》的蒙译进程与不同时期藏传佛教在蒙古高原的传播历史紧密相连,即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的元、明、清时期。元代希喇布僧格、却思吉斡斯尔等人的梵文、藏文佛教经典的蒙译活动以及从吐鲁番发现的元代畏吾体蒙古文佛教经卷残片均可证明藏文《大藏经》的部分经典早在元代已开始被蒙译的事实。16世纪后半期藏传佛教再度在蒙古地区传播时,土默特部阿勒坦汗和察哈尔部林丹汗曾组织人员蒙译藏文佛教经典《甘

珠尔》。而不同时期进行的这些蒙译佛经工作,对清代蒙古文《大藏经》的全部翻译完成和最终木刻刊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内外学者对蒙古文《大藏经》的翻译、刊行等问题进行研究已有多,尤其是关于北元时期土默特部阿勒坦汗和察哈尔部林丹汗曾组织人员蒙译藏文佛教经典《甘珠尔》方面已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澄清了不少疑难问题。但到目前为止,有关清代蒙古文《大藏经》的全部翻译完成和最终木刻刊行的文化、政治背景及其经过、清朝如何对其定价或颁行以及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在蒙古高原的流传等诸多问题尚未得到专门讨论。本文主要根据清代满文、蒙古文档案、文献和近代调查资料,围绕以上诸问题进行历史考察。

**[收稿日期]** 2021-08-08

**[作者简介]** 胡日查,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蒙古文《大藏经》文化价值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5ZDB125)的阶段性成果。

## 一、清代蒙古文《大藏经》翻译、刊行的文化、政治背景

藏传佛教经典藏文《甘珠尔》《丹珠尔》之所以在清代被蒙译、刊行并在蒙古地区大量流传是与元代以来蒙、藏高僧对佛教经典著作的翻译活动、16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在蒙古地区陆续建立的寺庙网络的形成和清朝在“大一统”政治背景下极力推崇、扶植藏传佛教的宗教政策以及对各民族推行“同文治之”的文化政策等文化、政治背景密切相关。

首先，元代以来蒙、藏地区佛教高僧对藏传佛教经典著作的翻译活动对清代蒙古文《大藏经》的翻译、刊行奠定了坚实的文本基础。众所周知，一种宗教在不同地区得以传播首先靠的是代表其最基本理论的经典著作被当地民众所接受。所以，早在元代藏传佛教开始在蒙古地区传播时，希喇布僧格、却思吉斡斯尔、比喇纳识里等人曾以畏吾体蒙古文翻译梵文、藏文佛教经典的一部分。其中，却思吉斡斯尔作为西藏高僧、元朝“国师”，通晓梵、藏、蒙古等多种语言，精通佛教典籍，他用畏吾体蒙古文不仅翻译了佛教经、咒二部分的大部分，还翻译了《入菩萨行论》。<sup>[1]</sup>元朝的另一高僧希喇布僧格曾在泰定帝也孙铁木儿（1323年-1328年）执政时期，将著名的藏文佛经《金光明经》译成蒙古文，还将藏文《甘珠尔》里的《圣五主尊大乘经》也译成蒙古文。<sup>[2]</sup>

16世纪末藏传佛教再度被传播于蒙古各部后，通晓梵、藏、蒙古三种语言的蒙、藏高僧辈出，梵、藏文佛教典籍的蒙译活动也由此再度兴起。1585年左右，察哈尔部出身的锡呼图·固什·绰尔吉首先蒙译了藏文《大般若经十万颂》。<sup>[2]</sup>1602年-1607年，以察哈尔部锡呼图·固什·绰尔吉和喀喇沁部阿尤希·固什为首的蒙古右翼三万户译师们奉土默特部那木岱汗、钟根哈屯（三娘子）和俄木布·洪台吉之命，将108函完整的藏文《甘珠尔》首次翻译成蒙古文。<sup>[3]</sup>1628年-1629年，奉蒙古末代大汗林丹汗之令，以夏日巴·呼图克图、贡嘎斡思和萨木丹僧格为首的蒙、藏高僧译师团队不仅把藏文《甘珠尔》又一次译成蒙古文，而且将其在磁青纸上用泥金书写共113函。<sup>[4]</sup><sup>110</sup>因此次翻译成蒙古文的《甘

珠尔》是在磁青纸上用泥金书写的，所以学界将其称为“林丹汗时期的金字甘珠尔”。

漠南蒙古各部归附清朝统治后，在蒙古地区传教的蒙、藏高僧在继续蒙译藏文《大藏经》相关典籍的同时，以抄写或刊刻的形式传播蒙古文《甘珠尔》部分经典的单行本。如一世内齐托音在喀喇沁地区传教时不仅亲自抄写《甘珠尔》，还派人至盛京买来墨纸、朱砂等物品，召集懂蒙古文的笔贴式抄写《甘珠尔》108部，赠给各蒙旗王公、公主、格格、大小台吉、僧侣、官员每人一部，令他们倾心供奉；还赠送北京满洲八旗都统大臣们多部，以为奉诵<sup>[5]</sup>，而且把藏文《甘珠尔》内的护法神的赞词以及短小的祈愿法文均译成了传统蒙古文的诗歌，通过此类方式来推动佛教教法的传播。<sup>[6]</sup>从内齐托音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用蒙古文传教的实际可推断，他抄写的文字应该是蒙古文。尤其是清入关以后，蒙、藏高僧掌握汉文木刻技术后，把翻译成蒙古文的佛教典籍木刻刊行，使得蒙古文佛教经典大量地流传于蒙古地区。如元代高僧希饶僧格蒙译的《金光明经》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康熙四年（1665年）和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以手抄或木刻形式流传于蒙古地区。<sup>[7]</sup><sup>11-12</sup>锡呼图·固什·绰尔吉蒙译的《故事的海洋》分别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和雍正六年（1728年）在北京木刻刊行。<sup>[7]</sup><sup>1421</sup>总之，自13世纪至清朝初期，蒙藏高僧对藏文《甘珠尔》为中心的佛教典籍的不断蒙译以及对其部分经典的木刻刊行对清代藏文《大藏经》的全部蒙译、刊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本前提条件。

其次，清初蒙古地区寺庙和佛学网络的形成对藏文《大藏经》的蒙译、刊行提供了佛学文化基础。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近半个世纪里，藏传佛教先从蒙古右翼土默特、鄂尔多斯、喀喇沁万户传播到左翼察哈尔、喀尔喀万户，后又在西边的卫拉特四部至东边的科尔沁等部广泛传播。蒙古各部大小领主纷纷模仿土默特部阿勒坦汗，带领自己的部众遗弃原始的萨满教，皈依藏传佛教，并从西藏格鲁派黄教首领那里获得各种封号，试图以宗教的权威维护各自的政治利益。由于藏传佛教的快速传播，这一时期的蒙古草原上不仅出现了像呼和浩特的大召、小召、席力图召、鄂尔多斯的伊克召、外喀尔喀的额尔德

尼召等早期寺庙，而且蒙古贵族子弟纷纷出家为僧。蒙古社会上从未出现的这些宗教因素对清入关后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内外蒙古各部先后归附清朝后，尤其是通过康、雍、乾时期对蒙古各部的治理，清朝统治者进一步认识到利用或扶植藏传佛教对统治蒙古各部的重要性，极力拉拢西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为首的僧侣集团的同时，在内外蒙古地区又确立了章嘉呼图克图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首的活佛转世系统，把自己扮演成藏传佛教的最大施主，即佛教的护法神——文殊菩萨，极力推崇藏传佛教。在清朝统治者对蒙古地区实施的“因俗而治”的宗教政策下，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得到了空前的畸形发展，内外蒙旗境内寺庙林立、喇嘛成群，以某一寺庙为中心的拥有广阔牧场和众多沙毕纳尔人口（喇嘛和寺庙所属僧俗人口）的僧侣阶层不断膨胀。

据《清内阁蒙古堂档》所录一份满文、蒙古文合璧档案显示，康熙末年拟赐匾额之内蒙古地区的寺庙共计15座。<sup>[8]</sup>其中，有科尔沁左翼中旗达尔汉亲王班第所建1座，科尔沁右翼土谢图亲王阿喇善之旗达喇嘛呼里沁贵格隆所建1座，土谢图亲王阿喇善之子鄂勒齐图所建1座，原科尔沁土谢图亲王沙津所建寺庙1座，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贝勒阿喇布丹所建之寺1座，昭乌达盟敖汉王垂木丕勒建造寺1座，阿鲁科尔沁旗协理台吉袞塔尔所建之寺1座，锡林郭勒盟阿巴噶多罗郡王乌尔彰噶喇布之旗协理台吉德木楚克建造之寺1座，乌兰察布盟喀尔喀右翼达尔罕贝勒旗贝勒詹达固密1座，章嘉呼图克图建造之寺1座，商都达布逊诺尔马驼群总管阿喇纳所建之寺1座，多伦诺尔达喇嘛罗卜桑楚勒德木噶布楚所建之寺1座，游牧察哈尔八旗正白旗达喇嘛根敦噶布楚建造之寺1座，呼和浩特大召额尔德尼迪延齐喇嘛所建寺庙1座。<sup>[8]</sup>著名的多伦诺尔汇宗寺、善因寺也由清朝国库出资，分别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和雍正九年（1731年）先后建立，并从内外蒙古各蒙旗挑选喇嘛、班第常驻于此，研习佛经，祝寿清朝皇帝。清朝国师章嘉呼图克图等西藏高僧亲临多伦诺尔寺，讲解佛经，传播藏传佛教教义教规，使得多伦诺尔成

为继呼和浩特之后的蒙古地区又一宗教文化中心。

另外，内札萨克蒙旗境内规模较大的大部分寺庙建立于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而那些寺庙均设有喇嘛们学习佛教五明学的却拉（显学）、洞阔尔（时轮）、卓德巴（密宗）、满巴（医学）等四大扎仓（学部），蒙、藏高僧在此收徒，传授佛学，并培养出一大批精通蒙古文、藏文佛经的僧侣。这对康熙、乾隆年间藏文《大藏经》的蒙译、刊行奠定了坚实的佛学文化基础。

再次，“大一统”多民族国家政治背景下清朝推行的“同文治之”的文化政策直接促进了藏文《大藏经》的蒙译和刊行。清朝推行的“同文治之”的“同文”意味着多语种为特征的多元民族与文化共存于同一统治体系之中，共同拥戴清王朝。乾隆所说的“天下之理则一”观念的产生，是多语种大一统国家发展的结果。同文的教化意义通过纂修书籍、规范语言等举措，整齐文教，实现治道合一。清朝多语种政治文化的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官方所使用的行政语言文字的多样性，即满、汉文字作为清廷准许的行政用语，以合璧的形式频繁出现在朝廷的文书里。康熙初年，坊间已有沈启亮编《大清全书》、佚名《满汉同文全书》、阿敦辑《同文广汇全书》等满汉文辞书颁行。到乾隆中后期，满、汉、蒙古语文乃至托忒、藏、察合台等语文一同汇集于清廷政治运作模式中，由朝廷主持编修的各类辞书随之刊行，坊间也出现了更多的满、汉、蒙古文合璧的辞书，并得到朝廷的确认与规范。就语言文字的层面而言，同文之治至此达到鼎盛。<sup>[9]</sup>

在清朝推行的“同文之治”的文化、政治背景下，梵文、藏文佛教经典著作也不断被翻译为蒙古文或满文，并被刊刻发行。如清康熙初年修补藏文《甘珠尔》版为开端，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开始刊刻蒙古文《甘珠尔》，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完竣；康熙六十年开始刊刻藏文《丹珠尔》和《宗喀巴全集》，蒙古文《宗喀巴全集》于雍正二年完成。乾隆皇帝即位后，又开始蒙译、刊刻《丹珠尔》（1741年—1749年），再后又有了满文《大藏经》。除此之外，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清朝还刊刻了大量多语种合璧的佛教经典。

## 二、蒙古文《甘珠尔》的勘刻与藏文《丹珠尔》的蒙译、刊行经过

内外蒙古各部归附清朝后，清朝统治者以藏传佛教保护者自居，试图通过驾驭宗教高僧进一步掌控蒙藏民族意识领域，主动提倡和优礼藏传佛教，使藏传佛教在内外蒙古地区得到空前传播。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内外蒙古高僧们翻译了很多藏文佛经并刊行，使佛经的蒙译和刊行事业达到了顶峰。其中，蒙古文《甘珠尔》的对勘刊行与藏文《丹珠尔》全文的蒙译、刊行便是典型例证。

清入关以前，蒙古各部中流传着藏传佛教经典藏文《甘珠尔》的不同蒙译抄本，但木刻版尚未制作。关于清代蒙古文《甘珠尔》的校勘、刊行时间和具体经过，18-19世纪成书的大部分蒙古文文献捎带提及。而纳塔著《金鬘》和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三月十九日的一份满文档案对其刊刻的经过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纳塔著《金鬘》载：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三月十九日，听到乾清门侍卫喇什传达的将要制作蒙古文甘珠尔刻版之令后，喇嘛僧侣、王、公、贝勒、贝子、塔布囊、官员以及广大施主如得满足心愿之宝而欢庆。苏尼特之希里贝勒、喀喇沁之贝子善巴喇什、乾清门侍卫喇什等上奏称，制作刻版之前，应将蒙古文甘珠尔与藏文甘珠尔比对校勘更佳等语。康熙帝准许彼等上奏，并下旨强调蒙古文甘珠尔与藏文甘珠尔比对校勘。领旨后，以教授多伦诺尔寺喇嘛班第佛经之札萨克达喇嘛锡呼图诺颜绰尔济、达喇嘛甘珠尔瓦罗布桑楚勒德木噶布楚、苏尼特贝勒希里、阿巴噶公德木楚克等为首的各札萨克之兼通双语的众多翻译者们将蒙古文甘珠尔与藏文甘珠尔比对校勘后制作出木刻版。”<sup>[4]245-246</sup>

这里提到的乾清门侍卫喇什为服侍康熙多年的贴身侍卫，其名在康熙朝官修文献中多有出现。据《章嘉呼图克图传记》记载，1707年乾清门侍卫喇什不仅施舍建造了多伦诺尔汇宗寺大门两旁的四大金刚佛像，而且章嘉呼图克图阿旺洛桑却丹病重时，带领皇宫御医前往多伦诺尔，为章嘉呼图克图治病。该呼图克图圆寂后，他又

代表朝廷，赴多伦诺尔离别该呼图克图舍利。<sup>[10]</sup>引文中提到的建议将蒙古文《甘珠尔》与藏文《甘珠尔》比对校勘的“苏尼特之希里贝勒”是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第四任札萨克多罗贝勒希里，康熙四十六年继任该旗札萨克多罗贝勒，卒于乾隆六年（1741年）。<sup>[11]276</sup>刊刻蒙古文《甘珠尔》时，他不仅提倡将蒙古文《甘珠尔》与藏文《甘珠尔》比对校勘，而且亲自参与组织蒙古文《甘珠尔》的勘刻工作。与“苏尼特之希里贝勒”一同建议将蒙古文《甘珠尔》与藏文《甘珠尔》比对校勘的“喀喇沁之贝子善巴喇什”是清代卓索图盟喀喇沁左旗札萨克镇国公善巴喇什，康熙三十年（1691年）袭职，康熙五十五年（1696年）因勤奋又稳重而受到皇帝的赏识并被晋升为固山贝子，但其卒于翌年。<sup>[11]191</sup>

如同上引《金鬘》记载，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三月十九日康熙皇帝降谕一等侍卫善绶的一份满文档案中更详细地写道：

“据悉，尔家藏有蒙古文甘珠尔。京城有藏文甘珠尔已刊刻。然蒙古文甘珠尔至今未刻，若刻版极佳，此乃好事。传令乾清门侍卫喇锡，传八旗蒙古大臣、侍卫、官员、笔帖式等共商。若布施刻版，刻印刊行后利于祭祀诵读。比起用手抄写价格又便宜，将此共同商议，若出布施，朕亦出资。钦此。”<sup>[12]</sup>

康熙刊刻蒙古文《甘珠尔》之令一出，喀喇沁左旗札萨克镇国公善巴喇什、苏尼特左旗札萨克多罗贝勒希里认为，

“现存蒙古文甘珠尔均为陆续抄写，其中遗漏、讹误字句居多，此一旦将其刻版，既为万世永久保存之经典。太皇太后处有藏文甘珠尔刻版，其对勘精湛，制作完美。若将我等蒙古文甘珠尔与此处藏文甘珠尔详细勘同，修补缺失、讹误之处，妥善刊刻甚佳。对勘此甘珠尔，拣选多伦诺尔之诺颜锡呼图、达喇嘛楚勒德木噶布楚及精通我等经书之贤者喇嘛、笔帖式等，将存于我处之蒙古文甘珠尔携往，共同详细校勘后，镌字木刻则更佳。”<sup>[12]</sup>

善巴喇什等提出的建议得到康熙皇帝的同意后，头等侍卫善绶处所藏蒙古文《甘珠尔》和太皇太后（孝庄皇后）处藏文《甘珠尔》被送

至多伦诺尔汇宗寺供喇嘛们对勘。可见，多伦诺尔汇宗寺对勘整理的蒙古文《甘珠尔》的底本为头等侍卫善绶所藏蒙古文《甘珠尔》抄本，而对照的藏文《甘珠尔》为孝庄皇后所藏 1689 年北京版藏文《甘珠尔》。

据北京版蒙古文《甘珠尔》目录函记录的译师名单，校勘《甘珠尔》时，北京、多伦诺尔、内外蒙古地区诸高僧大德、译师喇嘛、王公、贝勒、贝子、官方代表和工匠共有 200 余人参加。<sup>[13]</sup>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校勘整理蒙古文《甘珠尔》时，除了兼通蒙古文、藏文佛教经典的高僧参加之外，熟悉蒙古文的蒙旗笔帖式亦有参与。据有关呼和浩特土默特旗蒙古文档案记载，管理多伦诺尔全体喇嘛班第的札萨克达喇嘛诺颜锡呼图、达喇嘛甘珠尔瓦和监督校勘工作的苏尼特左旗第四任札萨克多罗贝勒希里、阿巴噶左翼旗辅国公德木楚克等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六月十八日致书与呼和浩特土默特右旗管旗章京，

“因校勘蒙古文甘珠尔与藏文甘珠尔时需要众多熟悉蒙古文的笔帖式，故收到此文后请立即把贵旗笔帖式阿日纳、古如斯齐足给十个月的钱粮派往多伦诺尔。因系谕旨，关系重大，请勿耽搁。”<sup>[14]</sup>

另外，从上引档案透露的信息可知，在多伦诺尔进行的蒙古文、藏文《甘珠尔》的校勘对照工作持续到康熙五十八年（1719 年）四月。在多伦诺尔进行的校勘工作完成之后，札萨克达喇嘛诺颜锡呼图等将对勘后的 108 函蒙古文《甘珠尔》，共计 45000 张送至京城。<sup>[12]</sup>而校勘后的经卷在京城木刻制版完成的时间应为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

康熙皇帝在位期间，清朝不仅把藏文《甘珠尔》在京城木刻刊行，而且把手抄蒙古文《甘珠尔》与北京版藏文《甘珠尔》校勘整理后又在京城木刻刊行。雍正皇帝继位后，为了完整地刊行藏文《大藏经》，召集当时藏传佛教界著名的土观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洛桑丹毕尼玛等高僧，在京城又木刻刊行了藏文《大藏经》的另一部分《丹珠尔》。<sup>[15]</sup><sup>91</sup>乾隆皇帝继位后，又组织蒙、藏地区高僧，把雍正二年（1724 年）北京木刻版藏文《丹珠尔》全部翻译成蒙古文并木刻刊行。

关于藏文《丹珠尔》的蒙译、刊行的具体经过，18-19 世纪成书的大部分蒙古文、藏文文献虽然略有提及，但不很清楚。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著《蒙古佛教史》记载了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及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洛桑丹贝尼玛等高僧接受乾隆皇帝下达的以蒙古文翻译《丹珠尔》的指令，先编修蒙古文、藏文合璧的《正字法—学者之源》后，二人便组织蒙古地区精通佛典的高僧大德以及精通两种语文的译师参加，“从阴铁鸡年（1741 年）十月十五日开始翻译，至阳水狗年（1742 年）十一月十五日全部完成。”<sup>[15]</sup><sup>92</sup>即该书中记载的藏文《丹珠尔》的蒙译工程起止时间在 1741 年-1742 年之间。纳塔著《金鬘》则载藏文《丹珠尔》的蒙译时间为“自铁鸡年（1741 年）冬月始，经八年至土蛇年（1749 年）六月终。共翻译 225 卷，同时把宗喀巴和章嘉呼图克图阿旺洛桑曲旦文集译成蒙古文并编入其中刻印”。<sup>[4]</sup><sup>245-246</sup>值得一提的是，《科尔沁诺颜呼图克图阿旺丹巴雅仁丕勒及其转世传略》记载科尔沁阿旺丹巴雅仁丕勒、乌珠穆沁公衮布扎布、乌喇特固什毕力棍达来等来自各地的高僧“于铁鸡年（1741 年）十月吉祥日至水狗年（1742 年）十一月十五日将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及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洛桑丹贝尼玛等藏文编写的《正字法—学者之源》全部译成蒙古文，并把它编成藏文、蒙古文合璧的词典刊刻。”<sup>[16]</sup>可见，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著《蒙古佛教史》所载《丹珠尔》的蒙译时间应为《正字法—学者之源》的蒙译时间。这样看来，藏文《丹珠尔》的蒙译工程实际上是分三步进行的，即 1741 年-1742 年之间先翻译刊行蒙古文、藏文对照佛经专用名词术语的《正字法—学者之源》词典；1742 年末-1744 年之间，把 225 卷藏文《丹珠尔》全部译成蒙古文；1745 年-1749 年期间，蒙古文《丹珠尔》的木刻印刷工程最后完成。

### 三、木刻版蒙古文《甘珠尔》 《丹珠尔》的定价、颁行及其流传

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勘刻与翻译工程是在康熙和乾隆皇帝的直接倡议下进行的，康熙强调刊行蒙古文《甘珠尔》不仅“利于祭诵”，且“较抄写价又便宜”，而乾隆则以藏文

《大藏经》的另一部分《丹珠尔》从未被译成蒙古文为由，为“众蒙古利好”，下旨章嘉呼图克图等开启蒙译藏文《丹珠尔》的工程。不仅如此，刊刻后清廷还直接参与了蒙古文《大藏经》的定价以及颁行环节。

关于清廷对北京木刻版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的定价与颁行，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一份满文奏折提供了重要信息。其原文汉译如下：

内阁大臣福恒等上奏：依旨备齐甘珠尔、丹珠尔以便迎请之事交与武英殿哈番。按工匠刊印之例计算，刊印一部藏文丹珠尔所需费用一千一百二十八两七钱，比喇嘛刊印节省五百三十六两三钱。刊印一部藏文甘珠尔费用四百六十五两五钱，比喇嘛刊印节省二百四十六两一钱。刊印一部蒙古文丹珠尔所需费用一千四百八十两八钱，比喇嘛刊印节省六百八十两一钱。刊印一部蒙古文甘珠尔费用五百八十三两八钱，比喇嘛刊印节省二百三十两五钱。如今以官方刊印处理，比喇嘛刊印节省甚多。每种经书刊印几部备齐，以便蒙古迎请。……据众蒙古迎请之情，备齐之经书迎请后将其再印各二部。现商定之价比喇嘛刊印之价节省，将这些节省的银两交与内库保管。……如今已备齐此类经书，且正值蒙古诸札萨克尚在此处，故交与部院传达蒙古诸札萨克，愿迎请者，将备齐之经书请去。此外，今后众蒙古奏报理藩院迎请经文，可不经礼部直接上奏后由武英殿取出备齐之经书，供其请去，价钱以现定之价处理。为此谨奏。请旨，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旨：依议。<sup>[17]</sup>

以上所引档案与相关档案记载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得知以下三个方面的信息。其一，1761年以前，蒙古人一直迎请喇嘛们在妙应寺刊刻的蒙古文、藏文《甘珠尔》《丹珠尔》。但清廷则以“喇嘛印刷，需时甚久，且蒙人亦感烦劳”，<sup>[18]</sup>并且以他们刊刻的一部经卷比起武英殿印刷的同一部经卷成本定价过高为由，自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之后，原妙应寺刊印颁发的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改由武英殿刊印颁行。

其二，武英殿印刷一部蒙古文《甘珠尔》所需费用为583两8钱，比起喇嘛们印刷的节省230两5钱。可见，喇嘛们印刷的一部蒙古文

《甘珠尔》定价为814两3钱；武英殿印刷一部蒙古文《丹珠尔》所需费用为1480两8钱，比起喇嘛们印刷的节省680两1钱，即喇嘛们在妙应寺印刷的一部蒙古文《丹珠尔》的定价为2160两9钱。值得一提的是，从引文中提到的比起喇嘛们定价所节省出来的银两交内府的情形来看，清廷对武英殿印刷的蒙古文、藏文《甘珠尔》《丹珠尔》的定价与喇嘛们所定的价格是相同的。

其三，从档案中提到的“今后众蒙古奏报理藩院迎请经文，可不经礼部直接上奏后由武英殿取出备齐之经书，供其请去。”的记载可以看出，蒙旗各个札萨克迎请《甘珠尔》《丹珠尔》时先上报理藩院，由理藩院上奏之后可将从武英殿取出备齐的经卷交给他们。另外，理藩院又通过进京参加年班的内外蒙古王公札萨克贵族，宣传或颁行武英殿印刷的蒙古文、藏文《甘珠尔》《丹珠尔》，使他们迎请到内外蒙古各旗。这对木刻版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在蒙古各部的大量流传提供了政策保障。

关于理藩院向内外蒙旗颁行武英殿印刷的蒙古文、藏文《甘珠尔》《丹珠尔》方面，据嘉庆六年（1801年）《理藩院咨伊克昭盟盟长鄂尔多斯札萨克贝子喇什达尔济文》记载，自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至五十七年（1792年）的30年期间，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右翼前旗札萨克贝子喇什色棱、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札萨克塔布囊齐齐克、喇嘛丹巴、台吉朋苏克、达喇嘛喇旺隆都布、昭乌达盟敖汉旗贝子罗布藏锡喇布、昭乌达盟巴林右旗台吉额尔德尼、昭乌达盟扎鲁特右旗札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噶喇桑等先后上报理藩院，各自请取一部。并在文中特别说明“蒙古文甘珠尔，支银八百一十六两八钱八分，蒙古文丹珠尔，支银两千一百六十两九钱。”<sup>[18]</sup>可以看出，自1761年清廷出台文件规定原妙应寺印刷的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改由武英殿刊印之后，理藩院对蒙旗札萨克王公和寺庙高僧先后颁行了多部蒙古文、藏文《甘珠尔》《丹珠尔》经，而蒙旗通过理藩院迎请的经卷“备价”与先前妙应寺的定价完全相同。

能够证明以上蒙旗札萨克王公迎请武英殿印刷的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的“理藩院咨喀喇沁公衙札萨克头等塔布囊齐齐克之文”载：

“理藩院之文，交付喀喇沁公衔札萨克头等塔布囊齐克。内府咨文内开，催缴之事，贵院致文称，喀喇沁公衔札萨克头等塔布囊齐克为祝寿圣上万寿吉祥，拟迎请蒙古文丹珠尔经。应付的二千一百六十两出售银上交内府仓等语。据查，此文虽已到达，然银两至今尚未交付。望贵院速交此银等语。故此事交付于喀喇沁公衔札萨克头等塔布囊齐克，速派人上交迎请蒙古文丹珠尔经之应付的二千一百六十两出售银交付给内府仓。为此致文。乾隆二十七年。”<sup>[19]</sup>引文中提到的“喀喇沁公衔札萨克头等塔布囊齐克”为清代喀喇沁中旗第三任札萨克头等塔布囊齐克，乾隆五年（1740年）受封札萨克头等塔布囊，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卒。<sup>[11]</sup><sup>196</sup>可见，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喀喇沁中旗第三任札萨克头等塔布囊齐克在上文提到的蒙旗王公中第一个迎请了一部蒙古文《丹珠尔》，而迎请的这部蒙古文《丹珠尔》的官方售价为2160两，这一价格与先前喇嘛们在妙应寺印刷的一部蒙古文《丹珠尔》的定价相同。这也证明清廷以妙应寺喇嘛们出售的2160两的高价把武英殿印刷的价值为1480两8钱的一部蒙古文《丹珠尔》卖给蒙旗的事实。

除了蒙旗札萨克王公高价迎请蒙古文《大藏经》之外，清代内外蒙旗寺庙高僧入京迎请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的佛事活动亦有之。如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双合尔庙高僧达日吉雅在该旗第八任札萨克郡王齐木德道尔济的支持下，于乾隆五年（1740年）进京，以1200两白银迎请新刻的蒙古文《甘珠尔》一部。<sup>[20]</sup><sup>311</sup>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科尔沁左翼后旗札萨克郡王齐木德道尔济又划掉2250两白银，把225卷北京版《丹珠尔》迎请到双合尔庙。<sup>[20]</sup><sup>313</sup>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第四世察罕迪延齐呼图克图入京参加洞礼经喇嘛年班，并把《甘珠尔》《丹珠尔》迎请到瑞应寺。<sup>[21]</sup>这种例子比较多，故在此不一一赘述。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迎请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的大部分蒙旗分布于内札萨克蒙古东部地区，而外藩蒙古喀尔喀、额鲁特蒙旗很少迎请。综观藏传佛教在蒙古各部的传播历史，东部蒙旗之所以迎请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其很重要的原因是与一世内齐托音呼图克图及其

众弟子在东部蒙古各部用蒙古语传播藏传佛教教义教规或以蒙古语诵经有直接的联系。因为喇嘛班第在寺庙各札仓研习佛教五明学或用蒙古语念诵佛经时，需要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经。而有清一代内札萨克蒙古东部蒙旗寺庙高僧和喇嘛班第以蒙古文学经成为他们的传统。这样一来，直到20世纪上半期东部蒙旗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均收藏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据1935年伪满洲国兴安局编写的《喇嘛庙产调查报告》统计资料，扎赉特旗翎化寺收藏蒙古文《甘珠尔》110卷、蒙古文《丹珠尔》227卷；科尔沁右翼前旗梵通寺收藏蒙古文《甘珠尔》中的单行本《优木经》（《大般若经》）12卷；科尔沁左翼中旗集宁寺收藏蒙古文《丹珠尔》225卷、蒙古文《甘珠尔》中的单行本《优木经》62卷；郭尔罗斯前旗崇化禧宁寺收藏蒙古文《甘珠尔》1部、《丹珠尔》1部；阿鲁科尔沁旗戴恩寺收藏蒙古文《甘珠尔》中的单行本《优木经》21卷；巴林右旗荟福寺收藏蒙古文《甘珠尔》中的单行本《优木经》52卷；土默特左旗瑞应寺收藏蒙古文《甘珠尔》101卷、蒙古文《甘珠尔》中的单行本《优木经》30卷、蒙古文《金刚经》230卷、蒙古文《药王经》20卷。<sup>[22]</sup><sup>32, 44, 54, 72, 80, 108</sup>至今保存在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的蒙古文《丹珠尔》即来自翎化寺所藏蒙古文《丹珠尔》。受内蒙古东部蒙旗寺庙的影响，故盛京（沈阳）实胜寺亦收藏蒙古文《甘珠尔》102卷，《丹珠尔》164卷。<sup>[22]</sup><sup>88</sup>所以，清至民国时期，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寺庙中更多地被收藏和传承下来，而内蒙古西部地区或外喀尔喀蒙古寺庙喇嘛多以藏文学习或念诵佛教经典，故那里的寺庙主要收藏藏文《甘珠尔》《丹珠尔》。

## 结语

西藏佛教大宗经典藏文《甘珠尔》《丹珠尔》之所以在有清一代对勘、蒙译、刊行并在蒙古地区大量流传是与元代以来蒙、藏高僧对佛教经典著作的蒙译活动、16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蒙古地区寺庙网络的形成、精通蒙、藏佛经的喇嘛高僧的辈出和清朝在“大一统”政治背景下极力推崇、扶植藏传佛教的宗教政策



以及对各民族推行“同文治之”的文化政策等文化、政治背景密切相关。

清入关以前,蒙古各部中流传着藏传佛教经典藏文《甘珠尔》的不同蒙译抄本,但木刻版尚未制作。康熙皇帝强调刊行蒙古文《甘珠尔》不仅“利于祭诵”,且“较抄写价又便宜”,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下令堪刻蒙古文《甘珠尔》之后,以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诺颜锡呼图、达喇嘛甘珠尔瓦呼图克图和苏尼特左旗札萨克多罗贝勒希里、阿巴噶左旗辅国公德木楚克等为首组织北京、多伦诺尔、内外蒙古诸高僧、译师、王公、贝勒、贝子、官方代表和工匠共200余人在多伦诺尔汇宗寺参加校勘整理蒙古文《甘珠尔》的工程。其校勘底本为头等侍卫善绶所藏蒙古文《甘珠尔》抄本,而对照的藏文《甘珠尔》为孝庄皇后所藏1689年北京版藏文《甘珠尔》。1720年,对勘后的蒙古文《甘珠尔》在北京木刻刊行。

乾隆继位后,以藏文《大藏经》的另一部分《丹珠尔》从未被译成蒙古文和以“众蒙古利好”为由,于乾隆六年(1741年)下令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和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洛桑丹贝尼玛等组织蒙藏地区高僧,把雍正二年(1724年)北京木刻版藏文《丹珠尔》全部翻译成蒙古文并木刻刊行。藏文《丹珠尔》的蒙译工程实际上是分三步进行的,即1741年-1742年之间,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和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洛桑丹贝尼玛等先翻译刊行蒙古文、藏文对照佛经专用名词术语的《正字法一学者之源》词典;1742年年底至1744年,将225卷藏文《丹珠尔》全部译成蒙古文;1745年-1749年期间,蒙古文《丹珠尔》的木刻版在北京白塔寺制作完成。

以康熙、乾隆为首的清朝统治者不仅提倡

蒙译、堪刻《甘珠尔》《丹珠尔》的大型佛教文化工程,还直接参与了蒙古文《大藏经》的定价以及颁行环节。即清廷以“喇嘛印刷,需时甚久,且蒙人亦感烦劳”,他们刊刻的一部经卷比起武英殿印刷的同一部经卷定价过高为由,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开始,把先前喇嘛们在妙应寺印刷刊行的蒙古文、藏文《甘珠尔》《丹珠尔》改为武英殿印刷。而定价颁行时,清廷把武英殿低成本印刷的经卷仍以喇嘛在妙应寺印刷的高价颁行给蒙旗,索取两种价格之间的差额。不仅如此,理藩院还利用蒙旗札萨克王公入京参加年班或寺庙高僧进京朝觐之际,先后颁行多部蒙古文、藏文《甘珠尔》《丹珠尔》。如1762年-1792年期间,各蒙旗札萨克王公和喇嘛高僧通过理藩院迎请的《甘珠尔》《丹珠尔》就有8部,而迎请者大部分为内札萨克东部蒙旗。综观藏传佛教在蒙古各部的传播历史,东部蒙旗之所以更多地迎请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其很重要的原因是与一世内齐托音呼图克图及其众弟子在东部蒙古各部用蒙古语传播藏传佛教教义教规或以蒙古语诵经的传统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喇嘛班第在寺庙各札仓研习佛教五明学或用蒙古语念诵佛经时,需要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所以,直到20世纪上半期东部蒙旗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均收藏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而内蒙古西部地区或外喀尔喀蒙古寺庙喇嘛多以藏文学习或念诵佛教经典,故那里的寺庙主要收藏藏文《甘珠尔》《丹珠尔》。值得一提的是,清代藏文《大藏经》完整地翻译成蒙古文并木刻刊行,不仅促进了蒙、藏、汉、满等多民族之间佛教文化的深度交流,而且对藏传佛教的本土化、中国化发展历史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 [参考文献]

- [1] 胡日查,乔吉,乌云.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25.
- [2] 康熙木刻版蒙古文甘珠尔[M].第14函第6篇,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本:221.
- [3] 佚名.阿勒坦汗传[M].珠荣嘎校注.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179.
- [4] 纳塔.金鬃[M].乔吉校注.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
- [5] 毕力袞达赖.内齐托音一世传[M].成崇德、申晓亭,汉译.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141.
- [6] 丹却扎木斯.白莲花传[M].贺·全布拉,蒙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315.
- [7] 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 [ 8 ] 清内阁蒙古档[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178-213.
- [ 9 ] 马子木,乌云毕力格.“同文之治”:清朝多语文政治文化的构拟与实践[J]民族研究,2017(4):84-94.
- [10] 章嘉呼图克图传[M].达尔吉·苏伊乐 校注.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143,147-148.
- [11]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M].包文汉、奇·朝克图 整理.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
- [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264.
- [13] 色·斯琴毕力格.蒙古文《大藏经》概述[J].蒙古学问题与争论(东京),2016(12):92-103.
- [14] 金峰.呼和浩特史蒙古历史文献汇编(第6辑)[M].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9:37-38.
- [15] 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蒙古佛教史[M].陈庆英、乌力吉 译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 [16] 斯·斯琴毕力格.科尔沁诺颜呼图克图阿旺丹巴雅仁丕勒及其转世传略[J].内蒙古社会科学(蒙古文版),1990(5):112-119.
- [1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满文档案 编号:3-179-1911-22.
- [18] 忒莫勒.关于清代北京版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经的刊印[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20-23.
- [19] 清代喀喇沁中旗蒙古文档案[M].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本.全宗号:504-2-2602.
- [20] 呼日勒沙.哲里木寺院[M].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3.
- [21] 陶克通嘎,诺勒玛扎布,宝德 等.瑞应寺[M].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4:60.
- [22] 伪满洲国国务院兴安局.喇嘛庙产调查报告(统计篇)[M].1939.

## Translation , Publication and Spread of the Mongolian *Tripitaka* in the Qing Dynasty

Huricha

(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 Hohhot , Inner Mongolia 010022)

**[Abstract]** Since the Yuan Dynasty , the Mongolian eminent monks have continuously translated the Sanskrit and Tibetan Buddhist scriptures into Mongolian. The temple education network formed in Mongolia in the 16th and 18th centuries and the Qing Dynasty ' s vigorous supporting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cultural policy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through adopting common language” for all ethnic groups provided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of Tibetan *Kangyur* and *Tengyur* into Mongolian and published in wood engraving. The rulers of the Qing Dynasty led by emperor *Kangxi* and *Qianlong* not only advocated the Buddhist cultural project of publishing and Mongolian translation of *Kangyur* and *Tengyur* but also directly participated in its pricing and implementation. The main reason for eastern Inner Mongolia can have and keep large collection of Mongolian *Kangyur* and *Tengyur* until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is directly due to the promotion of Tibetan Buddhism in Mongolian by the first generation Neiqi Tuoyin Khutugtu and his disciples and the tradition of chanting Buddhist scriptures in Mongolian.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the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Tripitaka* in the Qing Dynasty into Mongolian and made into woodcut prints did not only promote the in-depth exchange of Buddhist culture among Mongolian , Tibetan , Han and Manchu ethnic groups , but also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the localization and Chines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ibetan Buddhism.

**[Key words]** Qing Dynasty; Mongolian *Tripitaka*; translation; publication; spread

[责任编辑 乌仁图雅]